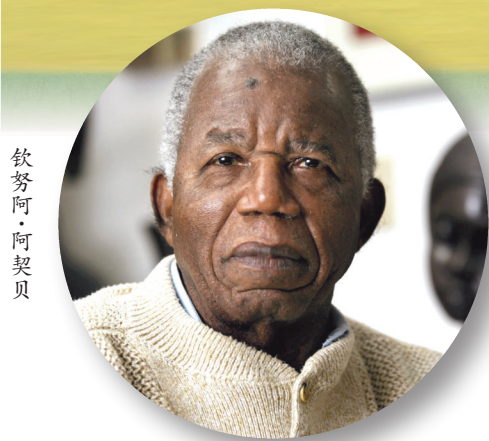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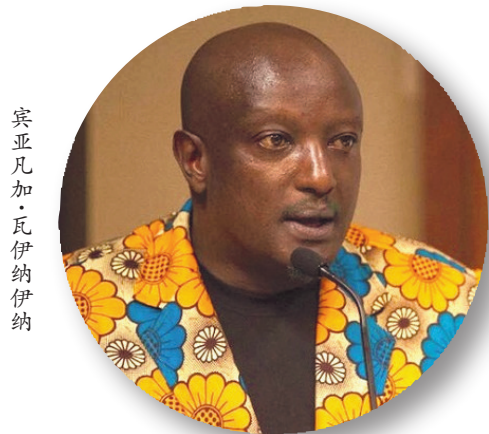
从西方叙事到中非互动——

非洲形象的多元化觉醒

□余静远



钦努阿·阿契贝



宾亚凡加·瓦伊纳伊纳



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契

在发表于1983年的文章《非洲的形象》(An Image of Africa)中,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写道:“这是西方心理中的一种欲望——甚至可以说是需求——将非洲设定为欧洲的对立面,一个既遥远又模糊熟悉的地方,与之相比,欧洲自身的精神优越性将得以显现。”随后,阿契贝以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说《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为例,这部被视为“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六部小说之一”的作品,“将非洲描绘为‘另一个世界’,欧洲的对立面,因此也是文明的对立面,一个人类自诩的智慧和修养最终被野蛮的胜利所嘲笑的地方”。更关键的问题是,《黑暗的心》中所呈现的非洲形象并非康拉德原创:“它是并且一直是西方想象中非洲的主导形象,康拉德只是用自己思想的独特天赋来书写它。”

西方文学和文化中普遍存在对非洲的偏见和简化,尤其是将非洲视为“黑暗大陆”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由来已久,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时代开始,到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通过多种方式塑造了非洲的形象,包括小说、旅行写作、人类学研究、地图、传教士记录、殖民档案以及援助机构的报告等。在这类文献中,非洲被描绘为一个充满异域风情、原始野蛮、贫穷落后的大陆。正如V. Y. 穆迪姆贝(V. Y. Mudimbe)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非洲的发明:灵知、哲学与知识秩序》(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中所言,对于西方人来说,主导非洲的描述多为以下字眼:腐败、营养不良、患病儿童、冲突、犯罪、网络诈骗、海盗行为等。在这些描述中,非洲被简化为一个充满问题的大陆。这种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通过知识体系、哲学思想和文化叙事建构起来的。穆迪姆贝借鉴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指出知识的产生和传播与权力密切相关,非洲作为一个文化和地理概念,并非自然形成,而是通过西方的殖民主义、人类学、哲学和宗教等知识体系被“发明”出来的,这种“发明”过程将非洲塑造为欧洲的对立面,即

“他者”,一个野蛮、原始和需要“文明拯救”的地方,而西方则被视为文明和进步的象征。

对非洲的这种刻板印象一直延续到21世纪。2005年,肯尼亚作家宾亚凡加·瓦伊纳伊纳(Binyavanga Wainaina)发表了一篇极具讽刺意味的文章《如何书写非洲》(How to Write about Africa),尖锐地批评了西方作家、记者和学者在书写非洲时常见的刻板印象和偏见。瓦伊纳伊纳通过夸张和反讽的手法,列举了西方书写非洲时惯用的套路,如将非洲描绘为一个贫穷、落后、充满战争和疾病的地方。他嘲讽地建议西方作家在书写非洲时,一定要在标题中使用“非洲”“黑暗”或“野生动物园”“游击队”“永恒”“原始”“部落”等词,他还语带讽刺地指出,西方作家常将非洲视为一个单一的国家,而非一个拥有54个国家、超过10亿人口的多样化大陆。文章还揭露了西方叙事中常见的“救世主情结”,强调西方的“慷慨”和“文明使命”,而非洲人则是不具任何自主性和创造力的被动接受者。瓦伊纳伊纳的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广泛关注,成为《格兰塔》杂志上最受欢迎的文章之一。

另一方面,自20世纪中叶大多数非洲国家开始走向独立以来,越来越多的非洲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开始主张非洲人应重新掌握对自己形象的塑造权,并通过本土的叙事恢复非洲的真实性和多样性。这种努力不仅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抗,也是对非洲自身文化和历史的重新发现与肯定。挑战西方这种刻板印象的重要方式之一是非洲人自己去书写和塑造自己、国家以及整个大陆的形象。2001年,加蓬学者丹尼尔·门加拉(Daniel Mengara)主编的文集《非洲的形象:刻板印象和现实》(Images of Africa: Stereotypes and Realities)出版,聚焦非洲形象的塑造与重构问题。门加拉批判了西方对非洲的单一定义,主张非洲人通过文学、艺术和历史研究来重新定义自己的形象,用“真实的”、本土产生的形象取代“人为的”、强加给非洲大陆的形象。在这个方面,钦努阿·阿契贝成为典范,他的小说《瓦解》(Things Fall

Apart)通过本土视角和非洲叙事成功地将非洲从“他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赋予非洲人以主体性,让他们成为自己历史的书写者。

这种对多元叙事的追求,在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演讲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2009年,阿迪契在TED的演讲《单一故事的危险性》(The Danger of a Single Story)中,以她独特的洞察力和感染力,揭示了单一叙事危害。她说道:“如果我对非洲的一切认识都来自于大众流行的影像,我相信我眼中的非洲也同样是充满了美丽的地貌、美丽的动物,以及一群难以理解的人们进行着毫无意义的战争、死于艾滋和贫穷、无法为自己辩护并且等待着一位慈悲的、白种的外国人的救赎……关于非洲的这个单一故事从根本上来自于西方的文学……西方社会讲述非洲故事的一个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充满了消极、差异以及黑暗。”阿迪契的这番话直指西方叙事的核心问题——它将非洲简化为一个单一的故事,剥夺了非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她呼吁非洲作家努力通过自己的作品重新定义非洲的形象,挑战西方的单一叙事:“故事很重要。多重性的故事很重要。故事一直被用来剥夺、用来中伤。但故事也可以赋予力量与人性化。故事可以击毁一个民族的尊严,但也可以修补那被击毁的尊严。”阿迪契的演讲不仅是对西方叙事的批判,更是对非洲作家和艺术家的激励,鼓励他们通过多元的故事展现非洲的真实面貌,重塑非洲的尊严与力量。

然而,非洲的形象从未、也绝不可能只有西方和非洲自身这两种方式,因为形象的核心在于交流。形象是关系性的,它被描绘者与试图理解这种描绘者之间的共同创造。根据《牛津简明英语词典》,“形象”(image)来自两个方向。首先,它是对某事物的表达或其对应物,是一种复制、象征、标志、表现、类型、典型例子或体现。它是对事物的近似描述——例如一种“人工模仿”——但它源于事物本身,并受到与事物关系的塑造。其次,形象是外部观察者或旁观者心中所持有的东西,它是一种心理画面或印象,一种

观念或概念。换句话说,形象既以其与事物的(不完美)联系为特征——其人为性、模仿性——也以其存在于他者想象中的形式为特征——作为一种观念、概念或心理画面。归根结底,形象是事物与其观察者之间共同塑造的东西,它是两者关系的产物。

正是在这种关系性的框架下,中国与非洲的形象互动也逐渐显现出独特性。中国和非洲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古代由于遥远的地理距离、稀缺的互动和有限的了解,二者间并未形成明确清晰的关系,因而非洲的形象在中国的叙事中相对较为模糊,只是一个异域的“他者”。20世纪中期的反殖民运动和革命热情将亚非拉国家团结了起来,标志性事件便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此后,非洲作为反帝反殖的盟友频繁出现在中国的叙事中。

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大国,与非洲国家的联系愈发紧密。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非关系更是不断深化。如果说初期国人对非洲的想象和书写还沾染西方刻板印象的影响,那么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作家逐渐摆脱了西方的叙事框架,转而以更加平等和多元的视角呈现非洲的复杂性多样性,尽管在叙事深度和广度上仍有欠缺,且多以旅行、日记等纪实性题材为主。毕淑敏的《非洲三万里》即通过旅行文学的形式,记录了在非洲的所见所闻,如非洲草原上奔跑的羚羊、夕阳下的沙漠,以及当地人民在艰难环境中展现出的乐观与坚韧。她笔下的非洲不再是西方叙事中那个充满苦难和绝望的“黑暗大陆”,等待“救世主”的拯救,而是一个充满生机、坚韧和希望的地方。这种叙事的转变,不仅是中非关系从历史盟友迈向文化共鸣的见证,更是全球文化版图中一次意义深远的多元化觉醒。通过平等的对话与文化交流,中非双方正在携手编织一幅更加真实、丰富且充满希望的非洲画卷——一个不再被单一叙事束缚,而是由多元视角共同塑造的非洲形象。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编辑)

桑塔格研究的三个突破

——记与《桑塔格与中国》有关的往事

□柯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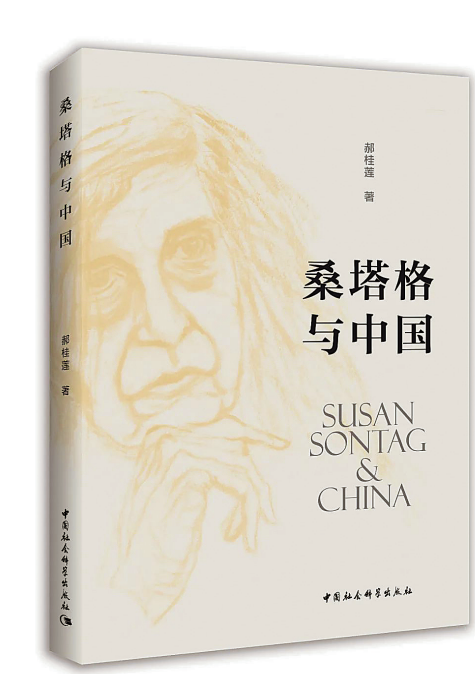
2012年的冬天,郑州大学的张莉教授与我多次“来电”后,终于在南京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中“奔现”。是夜,她带着我,穿过鼓楼校区招待所幽暗的走廊,来到一间客房,按响了门铃。一个目光炯炯有神、面容温柔平静的女子应声开门,这就是云南师范大学的郝桂莲教授。六目对视一笑间,走廊似乎明亮起来,一个充满着姐妹情谊的“铁三角”就此铸就,而把我们的学术兴趣焊接在一起的,是美国作家、文艺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我们共同的研究对象。

其时,郝桂莲老师已经在多家“外字头”的权威期刊上发表了不止富于洞见的桑塔格专题论文,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禅”释“反对阐释”》(详见《外国文学》2010年第1期)。这篇文章从语言、体验和对待终极意义的态度上对比了禅宗的“禅悟”和桑塔格著名的“反对阐释”观,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反对阐释”所暗含的禅意,在众多与桑塔格相关的论文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地融合了以先锋性闻名的张杨激进的桑塔格思想和低调内敛、静水流深的东方智慧,显示了作者横跨东西、纵贯古今的学术灵性。

巧合的是,2015年初,当我离开温婉的苏州一头扎进费城凛冽的寒风中,在大学城茫然四顾之时,我又遇到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英语系访学的郝老师。她以谦逊稳重的风格,一一化解中国学人身处异国他乡的种种问题,为浮躁焦虑的我指点迷津,近距离地展示了她对中国智慧的深刻理解和随时随地灵活运用的能力。

因此,当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揭晓,郝桂莲以《中国文评话语体系下的苏珊·桑塔格研究》为题成功立项时,我喜而不惊。毕竟,自2007年开始从事桑塔格研究以来,郝老师不仅同时教授外国文学经典和西方文论,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深耕细挖,体悟到中国文化何以能深深吸引自小浸润于西方文化中的桑塔格,并激发她的无尽想象,令她无比痴迷。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人比郝老师更关注桑塔格与中国的关联,也没有人比她更适合开展这个项目,在外国理论介入国内文学研究的众声喧哗之中,发出清晰而独特的“中为洋用”之声。郝老师经过数年更为深厚的积累之后,视野更为广阔,将项目的最终成果名称定为《桑塔格与中国》,该书于2023年12月正式出版,为国内外的桑塔格研究增添了一部高质量的著作。

《桑塔格与中国》有诸多创新之处,最突出者至少有三。首先,郝桂莲老师一反以往国内桑塔格研究者以西方理论为指导、以西方阐释为基础的做法,从中国文评话语体系里寻找研究支点,从中国视野和中国智慧里获取研究灵感,把桑塔格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体现出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自觉和理论自信。其次,郝老师在书中大大拓展了研究内容,突破了以往



苏珊·桑塔格

桑塔格研究中或只关注其文艺思想或仅聚焦其文学创作的单一选择,把桑塔格的整体成果置于批评框架内,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研究范式。此外,她通过桑塔格这个个案,搭建起东西方美学的桥梁,以中国学界熟悉的传统哲学和文化概念去观照西方的美学思想,拉近二者之间的距离,在了解国外成果的同时也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思想精髓的认识。

当我们展卷细读,就会发现郝老师深厚的学术涵养赋予了这部著作丰满的立体感,笔触面面俱到,论述严丝合缝。她充分挖掘桑塔格与中国文化在意识上、思想上的关联性,结合中国传统文论,从创作主体、文学与批评、文学与社会、文学与道德、文体与修辞、影像与观看这六个方面全景式地解读了桑塔格的美学思想和文学创作。这在当前的桑塔格研究中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就像一件精巧的双面绣作品,正反面浑然一体,中国文化的魅力与桑塔格的一生心血交相辉映。用郝老师自己的话说,“相互照亮,互相照鉴,这正是本书所提倡的不同文化文明间对话的方式及宗旨”。尽管《桑塔格与中国》属于个案研究,但它打开了一扇窗户,并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在窗下贴心地铺设了垫脚石,让我们得以站在上面,透视那些滋养和塑造出桑塔格独特风格的文明成果和社会现实,启发我们纵深剖析西方各种文艺

思潮和社会问题。

桑塔格的一生,可以说是致力于消除差异的一生。她力图拆除所谓高级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壁垒,用犀利冷峻的语言,把那些被冷落、被低估的作家、思想家、艺术家的名字重新带进公众视野;她不断跨越各种界限,一次次地证明思想的多重表达形式,比如小说、散文、戏剧、电影等等;她不动声色地走进一度被男性占据的领地,宣告一个比肩而立的女性个体的存在;她用自己的行动和文字,而不是空洞的呐喊,向世界证明知识的价值和知识女性的力量。桑塔格深信自己的生命孕育于中国,这里也是她父亲魂归之处。她对中国的天然亲近与激情乃至乡愁式的依恋,值得有人为此著述。郝老师的中西学养和对桑塔格其人其作的敏锐洞察,使她成为这一使命的最佳人选。《桑塔格与中国》——诠释了桑塔格的上述特质,也是郝老师本人的思想和学术精神写照。

“桑塔格”与“中国”必然相遇。从多年前着手研究桑塔格开始,郝老师探索不止,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循着她多年来稳健的学术足迹,我们见证了一场如期而至的深情相遇。时值春日,在南京绚烂的花海之中,我隐约看到了2012年那个夜晚在一幕幕闪现,那也是一场必然发生的思想碰撞。

(作者系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尼日利亚画家托伊恩·奥吉赫·奥杜托拉作品

壹果文壇

SHIQUE WENTAN